

民国时期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路径及对该阶段财政著作的影响

<http://www.criifs.org.cn> 2007年4月9日 朱鸿翔

摘要:考察民国时期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路径和对财政著作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西方先进思想在中国理论构建所起的作用。文章从传播主体、路径和具体著作等方面为切入点,试图通过统计分析和比较说明等方法以揭示当时传播的关键元素,为后来研究者做一个铺垫。

关键词:民国时期 西方财政思想 传播 路径

一、民国时期西方财政思想传播的主体和路径

1912年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际,孙中山就曾经发表宣言强调财政统一,并阐述了具体的财政整理计划,其中包括:“统一国库”、“设立中央银行、集中纸币发行权”、“整理公债”、“改良币制”、“划定国地收支”等设想。这些方针表明,建立现代的财政体制成为国民政府的追求目标,此后西方财政理论也成为整个民国时期财政研究的核心内容。

和清末民初时期一样,很多有过国外学习经历的人成为传播西方财政思想的主流。该时期一些著名的财经学者都有较好的国外学术背景,比如何廉是耶鲁大学的博士,尹文敬是法国巴黎大学的博士,而陈岱孙和马寅初则分别是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他们两个人的博士论文主题都是关于美国城市财政制度。

这一历史时期另一个较为显著的特征是出版业的蓬勃发展和教会学校的增多促进了西方先进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如陈望道创办的大江书铺分别于1931年和1933年出版了由施复亮翻译的日本阿部贤一所著《新财政学》和大内兵卫著《财政学大纲》。中国教会学校在这一时期对传播西方经济理论起到了桥梁作用。对于西方经济或财政思想的传播,教会大学成绩斐然,比如圣约翰大学的商科就注重经济理论学习,而沪江大学的商科则注重经济学的中国化,强调学以致用。

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国内大学在西方财经理论传播和教育方面,在探索财经类教育和研究的中国化方面很有成就。何廉和李锐编写的财政学以及尹文敬编写的财政学都对中国的有关现实经济问题进行了论述,何廉为在教材中反映中国的公共支出情况,从当时的财政部收集中央政府有关各时期的收支资料,为反映中国的税收和公债情况,他通过海关和其他一些政府机构及各种出版物等渠道整理大量的现实材料用于教科书的编写,在他的一些讨论当时现实经济情况的著作中,甚至使用了计量经济学这一当时在国际经济学界也非常前沿的知识,显示了西方财政理论在中国传播的效果已不仅仅满足于单纯的介绍和阐述。

这一时期西方财政理论传播的主要路径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第一,财政学著作,其中包含财政学专著如李权时的《财政学原理》上下册、何兼、李锐的《财政学》、尹文敬的《财政学》、千家驹

的《新财政学大纲》、梁式文的《财政学大纲》等,千家驹和梁式文的著作中都有对西方财政学说沿革的详细介绍,千家驹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叙述西方财政思想的发展,具体分为欧洲古代的财政思想、资本主义的财政思想、现代的财政思潮等,同时该章还罗列了欧美各国的财政学参考书籍以及民国以来部分国内的财政学著作和资料。上列其余三种则皆为教科书,书中内容基本是西方财政理论的译介,象尹文敬的财政学中很多内容就是从其在巴黎大学留学时所得老师讲稿选择而来。另外,经济学原理的著作中也多涉及财政学内容,如1928年出版的李权时所著的《经济学ABC》一书的第六章为财政论或公共经济论,该书从岁出的种类、原则、岁出和国民生产的关系以及岁入的种类、租税的原则和种类、公债等方面比较全面的介绍了财政学的基本知识。第一大类著作中还包括包含西方财政思想和学说的经济学说史或经济思想史书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毓珊所著《经济思想史》分二十章介绍了从古代的色诺芬、柏拉图一直到巴尔锡维克主义。其中在对各学派的经济思想进行探讨时,亦有对其财政思想的涉猎。第二,经济学杂志,这当中既有专门的财政金融类杂志如财政评论社的《财政评论》、上海银行学会的《银行周报》,也有涉及到财政问题论述的经济类综合杂志,如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中外经济拔萃》和《中外经济年报》、中国经济学社的《经济学季刊》,再有就是经常刊登财经内容的综合性杂志,如《东方杂志》。在杂志中还有特殊的一类是各高校的学报,如清华大学的《清华学报》、安徽大学的《安徽大学月刊》。第三,财政学年鉴或辞典类,前者如财政部编撰的《财政年鉴》,后者中如潘文安、张一凡主编的《金融财政大辞典》,在这本辞典中,财政理论、财政术语各占了八分之一,财政实际材料占了八分之二,还有相当部分的财政政策摘编。第四种路径是课堂传授,本时期中国对国外商经类教育的移植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照模式,也促进了中国现代经济类教育的发展。当时从欧美回来的很多留学生都在国内的大学任教,他们在课堂上所使用的讲义都是从西方教科书上学来的或者根本是他们的听课笔记,因此他们讲授的知识甚至案例基本都是外国情形。第五是报纸,一些比较闻名的报纸当时也介绍经济理论,点评政府财政政策,如1933年沈志远的《计划经济学大纲》就刊载在申报上。

二、这一时期西方财政思想的传播对中国财政著作的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财政理论研究获得较快的发展,研究体系也逐渐完善,根据胡寄窗先生的统计,30年代共出版财政学著作86部,40年代计47部,其中1925-1937年之间共出版了17部,占本时期财政著作的60%以上。在这一时期的财政学著作中,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这些著作中论述财政学原理的较少,只有24部,其中8部译作,16部自撰,比较典型的译著包括李祚辉译,日本马场莫一著的《财政学新论》(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版)、童蒙正编译,德国瓦格涅所著的《瓦格涅财政学提要》(上海大江书局1931年版)、李百强译,美国斐伦卡尔著的《财政学大纲》(上海大江书局1933年版)以及大卫兵内著的《财政学大纲》(上海大江书铺1933年版)、许炳汉译,印度喜拉斯著的《财政学新论》(上海商务1933年版)、杜俊车译,美国道尔顿著的《财政学原理》(上海黎明书局1933年版)、区华山译,日本宇都宫鼎著的《(最新)财政学纲要》(广州美华书局1935年版)。国内学者编著的著作中较典型的有陈启修著的《财政学总论》(上海商务1934年版)、李权时著的《财政学原理》(合订本)(上海商务1935年版)、何廉和李锐合著的《财政学》(上海商务1935年版)、尹文敬著的《财政学》(上海商务1935年版)、钱亦石著的《财政学纲要》(上海中华书局1935年版)、梁矩章著《财政学大纲》(中国计政书局1942年版)、梁式文著的《财政学大纲》(广州大学出版社1942年版)等。从统计来看,翻译的著作基本上都是在1935年以前出版的,1935年后的财政学原理著作基本都为国人自撰,其中陈启修的《财政学总论》、李权时的《财政学原理》、何廉和李锐的《财政学》以及尹文敬的《财政学》较为畅销且流

传较广。这几本著作各有特色,陈启修的著作大部分取材于小川乡太郎的财政学,是以作者在北京大学的讲义为蓝本编制而成的;李权时的著作着重介绍了英美的预算制度;何廉和李锐的著作则偏重于中国财政制度的介绍;尹文敬的著作对于财政学的理论介绍的非常详尽,条理清楚,文笔流畅,对于支出论及预决算论中的法理论述尤为精到。考察本时期翻译引进外国财政思想的轨迹,传播来源由日本向欧美转变,这种转变的原因既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亲英美外交路线有关,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国内学习西方理论的水平在提高,眼界也更加开阔,不再以日本作为西方理论传播的中转站。

其次,从20年代末期以来出版的财政学著作中来看,该时期国人自撰的著作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了外国译作,尤其是抗战后这一现象更为明显。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从财政学基本理论的传播来看,由于本时期出国留学的学生开始次第回国,他们对西方财政思想和理论的深刻把握使得他们自己编写财政学著作成为可能,而不再是仅仅满足于翻译照搬外国的原著;其次,西方财政学著作都是针对西方特定的市场经济环境而作的,他们的理论核心建立在市场—价格机制运行的基础之上,对于中国来说,当时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政治上尚未完全统一,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缺乏有效的市场体系,价格体制也不健全,各项财政制度都急待整理,因此,西方财政理论的很多概念和范畴并不能直接运用于中国的财政面临的问题,特别是抗战爆发后,对于如何在战争因素的外在制约条件下实行战时财政政策以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问题国人更是出版发表了大量的著作和论文。而西方研究中国财政的学者当时并不多见,西方学者撰写的关于中国财政专题的著作更是凤毛麟角,这也是导致国民政府后期国人自撰著作远远超过外著的重要原因。

第三,尽管在30年代后国内出现了大量国人自编的财政学理论著作,但是由于时代和自身知识所限,这些著作并未能建立自己的独特体系,大都仍然是对西方财政理论的阐释。

第四,本时期出现了以特定的财政部门、财政制度、财政现象等为对象的专题研究,如属于比较财政制度的有:常乃德的《各国预算制度》(1930)、黄卓的《各国财政制度》(1935);属于财务行政的胡善恒的《财务行政论》(1934)、陶元玲的《财务行政实践》(1942);属于租税理论的岑德彰译自leligman的《累进课税论》等。

第五,这一阶段用西方财政理论研究民国财政史的著作也出版较多。其中较出色的有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1930)、贾德怀《民国财政简史》(1930)和李景铭的《中国财政史》(1931)等。

《民国财政简史》虽为财政史学著作,但从其编排看,涉及国地收支划分、岁入(财政收入)、岁出(财政支出)、公债、会计(预决算)等等现代财政内容,该书的某些章节还包括了财政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关系、财政制度利弊的评价等,显然该作品已深受现代财政学理论的影响。

第六,在国民政府后半期,因为抗战这一特殊事件使国内的财政学关注点开始有所转向。一是注重用西方财政学理论来解决战时的政府财政问题,如尹文敬的《非常时期财政论》就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方各战费筹措为例对该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二是对西方各国的财政政策着墨较多,特别是敌对阵营的日本和德国的财政情况和采取的财政政策。

第七,这一阶段的一些财政学著作如罗介夫的《中国财政问题》(1933)、贾士毅的《国债与金融》(1930)、李权时的《中国关税问题》(1936)等在论述中国财政问题时,能够就财政问题与当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总结。

第八,本时期中国财政学者对于国地收支划分的研究较清末有更大深入,他们试图改变中国传统

财政理论中主张财政权高度集中于中央的状况, 以此和国际财政理论接轨, 同时各地方政府也编印了许多各地的财政概况、财政理论改进计划、财政业务报告、地方财政史等相关书籍。

第九, 这一时期财政学传播的范围有所扩大, 苏联的财政理论也引起了不少学人的关注。国民政府后期, 介绍苏联财政的著作出版较多, 如1946年出版的韩塞欧所著《苏联财政制度》、1949年初出版的吉雅琴科所著《苏联财政的信贷》和焦敏之编译的《苏联财政》等等。

最后, 在国民政府的中后期, 政府相关部门开始参与财政学相关资料和书籍的整理、汇编。如1937年出版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经济计划委员会编写的《十年来中国之经济建设》记载了建都南京到1936年中央与地方政府各项经济事业的报告, 其中的第四章“财政”由财政部编写, 反映了这一段时期的财政情况。1943年由财政部编撰、中央信托局印的《十年来之财政》、《十年来之财务行政》、《十年来之关税》、《十年来之海关》、《十年来之金融研究工作》、《十年来之财务统计》等系列丛书则分类介绍了国民政府1927 - 1937这十年的财政情况。1935年出版的财政部所编的《财政年鉴》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现代财政学意义上的年鉴。

参考文献:

1. 谈敏. 中国经济学图书目录(1900~1949年) [M].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5
2. 胡寄窗. 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3. 胡寄窗, 谈敏. 中国财政思想史. [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8(

文章来源: 经济师 (责任编辑: xl)